

# 以「詞語」爲生的人

●杜小真

Jean Paul Sartre, *les Mots* (Paris: Gallimard, 1964); 中譯本《詞語》，潘培慶譯（北京：三聯書店，1988）。

寫《詞語》(*les Mots*)的薩特(Jean Paul Sartre)要比寫《存在與虛無》(*L'être et le Neant*)的薩特可愛得多。

他一掃寫哲學專著的沉悶、晦澀的筆風，娓娓動聽地敘述着他從書中開始的生命。我聽到了他和着詞語的行進節奏向前延伸的生命節奏，我看到了一個從詞語中走來的真實的薩特存在。

他是在詞語中發現存在的。如果《詞語》僅僅是一部純粹的童年自傳，那它不會給人以如此震動。古今嗜書為命的文人可謂多矣，但清醒地認識這種「偏見」，敢於正視這

種「偏見」並嚴肅加以解剖並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 偉大的懺悔錄

優秀的自傳的產生大概起碼要有兩個條件：一是與要寫的對象有時間距離，二是要對所寫的對象有足够的反思。薩特的《詞語》實際上在1953年就已初成輪廓，1964年方正式出版。這出版時間的拖緩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考慮這距離與反思的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近二十年的時間裏，薩特實際上是在一種寫作的狂熱中生活，他唯一的工作就是寫作。時至50年代，薩特歷經滄桑，重對歷史反思：對曾嚮往過的蘇聯模式的失望，對阿爾及利亞戰爭的反感，對非洲饑荒的震驚，對超級大國冷戰的恐懼……於是，



圖 寫《詞語》的薩特  
要比寫《存在與虛無》  
的薩特可愛得多。

次深刻的精神危機：他突然感到除了寫作之外還有許多別的事情，甚至是更重要的事情。他困惑地自問：自己前幾十年的寫作狂熱，自己為之忍受的如此困苦和寂寞，為之付出的如此辛勞與精力是否值得？又是否真正改變了甚麼？《詞語》正是這次精神危機的產物，是一個被評論界稱為「蘇醒階段的薩特」對自身存在進行反思的結果：「我突然清楚地看到統治着我以前全部作品的那種狂熱……我冷靜地看到我生來就是為着寫作的。為了證明我的存在的需要，我曾把文學當做一種絕對。我花費了三十年的時間才從這種精神狀態之中掙扎出來。當我不得不與共產黨分手時，我就決心寫我的自傳。我要指出一個把文學當作神聖的人怎樣過渡到行動中去，雖則這個行動始終是知

識分子的行動。」（法國《世界報》，1964年4月18日，薩特與《世界報》記者談話錄。）正是為此，年逾「知天命」之年的薩特寫出了《詞語》，他把童年當作一面鏡子，用成人的目光審視它，在童年面前重新發現自己。與此同時，他的《詞語》也在向世人坦露自己。薩特不但繼承了啟蒙學者盧梭等人主張自由、平等的人道主義，而且繼承了他們對世界、他人，對自己嚴峻而近於冷酷的解剖精神。從這個意義上講，《詞語》是一部懺悔錄：對過去的反思，對自身狂熱的反省。曾是薩特摯友後又成為敵手的加繆有過與薩特同樣的精神危機，也有過類似的狂熱。他們都用相近的文學形式進行自我懺悔，而且語言優美、通曉流暢。因此，把薩特的《詞語》與加繆的《墮落》共譽為二十世紀西方最

偉大的兩部懺悔錄是言不為過的。

## 存在精神分析法

《詞語》的動人之處還在於他是薩特「存在精神分析法」的一次實際應用：回溯到童年尋求他後來狂熱的根源以說明成年的薩特何以是如此的薩特。這種前進—逆溯的方法在薩特看來是解釋具體個人的唯一正確方法。50年代以來，薩特極力想克服他在理論上的矛盾與困難，希求借助馬克思主義。存在精神分析法就是這種努力的一個重要步驟。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方法是正確的，但有很大缺陷：即「只關心成人，讀了他們的論述，我們似乎是在領取第一次工資時出生的，他們忘記了成人們有各自的童年。」這種方法能解釋法國大革命為甚麼會造就一個拿破侖，但卻無法解釋為甚麼是這個拿破侖，而不是別的人。因而應把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前進方法與存在主義的逆溯方法結合起來，即在深入時代（歷史）的過程中前進地規定生平，同時又在回溯

生平的過程中規定時代（歷史）。在研究波德萊爾、特別是研究福樓拜時薩特運用的就是這種方法，在研究自身時他用的亦是這種方法。

## 從詞語來，回到詞語去

薩特在童年中找到了自身狂熱的根源，他用《詞語》證明他蘇醒復原了。但是，他卻還沒有擺脫狂熱，擺脫那不可逾越的童年造成的偏見。被馴化了的野獸尚能在某一時機恢復野性，進行反叛。人則更是受到童年的制約——在生命長河的任意一點上都會找到它的印記。

從詞語中走出來的薩特必然要回到詞語中去，不管後來歷史如何作用，也不管他本人如何企圖擺脫，純粹知識分子的這層「膜」粘在他的身上，就永遠也退不下去。

杜小真 北京大學外國哲學研究所  
研究人員。